

第十章

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302 当普通的日本人被直率地问及他们是否想要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时，压倒多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最初，大多数人单是被问及这个问题都会深感震惊。因为在1945年10月之前，这一质问本身就是大不敬，更遑论否定性的回答。后来的民意调查继续显示出对存续天皇制度的强烈支持，但是这具有误导性。因为如果依照费勒斯（Fellers）的解释，与战时普遍存在的狂热崇拜与深切敬畏相比，情形已经大不如前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天皇的投降诏书刺破了对天皇的崇拜。当“圣战”结束时，对天皇这位大司祭和往昔的“现人神”的崇拜也终结了。当时的警方报告以及其他证据表明，许多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仿佛已经只是其命运的旁观者了。

成为旁观者

使费勒斯和其他西方分析者如此迷醉的天皇崇拜，看来很大程度上只是事情冠冕堂皇的表象，即日语所说的“建前”。一旦战败成为事实，军事国家崩溃，普通日本人流露出的对于天皇制和所谓国体的“本音”
303（真实情感），更近乎于和缓的依恋、听任甚至是漠不关心。这种对天皇制的超然，反映在战时及战后内务省完成的机密报告之中。投降之前的警方报告，揭示出警方不断上涨的忧虑：随着战况的恶化，不敬事件增多了。报告书显示，甚至孩童都被认为是煽动言行的肇始者。在某个案例中，警察认定犯了不敬罪的少年，从报纸上剪下天皇的照片，仿照战死者骨灰盒的模样，将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警方卷宗中另一神经质的

记录，则是在东京空袭开始后不久，警方注意到孩子们在快乐地唱一首期待皇宫也被烧掉的童谣。¹

这些不吉的预兆使人神经紧张，不仅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还因为保守派们清楚，历史并不站在他们一边。十九世纪中叶，就像是脱去破旧的衣服一般，日本人轻易抛弃了700多年历史的封建幕府将军制和武士社会。从1868年开始，从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开始，日本只经历了不到一个世纪的近代天皇统治。在日本历史上，还没有其他政权、其他领导人，历经裕仁统治时期这样的毁坏与灾难。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为外国的占领军打开大门。这些顾虑可使人心神不安。

具有世界视野的保皇者们，也十分清楚二十世纪君主政体的死亡率之高。中国的帝制，据说顺应“天命”且历经两千年之久，于1911年垮台。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度强盛、令人敬畏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土耳其帝国的倒台。当日本人考虑他们天皇制的命运时，在战败的意大利，君主政体正风雨飘摇。1946年6月，意大利萨伏伊王室，据称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室（而且是以“神的恩宠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其存续被全民公决所否定。环顾日本国内外，考察历史与现实，天皇拥护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惧怕，战败即便不导致对天皇制的公然敌对，至少会使大众对皇宫里那个遥远的人物的命运不再关注。

占领者的活动开展之后，思想警察继续运作了相当一段时间。8月、9月以及10月初的内部报告，有充足迹象表明，尽管对大规模反对天皇制的恐惧并无必要，漠不关心的情形则又另当别论。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担忧很快就会烟消云散。9月初，宪兵队的一份机密报告，预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混乱”问题，包括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主权在民思想”和“金权万能思想”。滋贺县的警察报告称，“战争结束前后，一般民众对军队、当政者的不信任和反感增强，尤其是对天皇的不敬言行有增加倾向，正在锐意视察取缔之中”。9月的一份报告，在处理东久迩首相声称裕仁对偷袭珍珠港没有责任的民众反应时，总结说有见识的人都怀疑这种说法。民众发现很难将天皇无责任的景象，与天皇下令开战或是当时大肆宣扬的天皇是终战的关键人物的说法调和起来。²

卷帙浩繁的警方报告也详细记录了有关天皇的谣言：他在战败广播后因心力交瘁而驾崩；他因面部神经痉挛卧病不起；他自杀了。有谣言

说他已经退位，有些说法还挺详细逼真：由于是战争责任人，他让位给了年轻的皇太子明仁，但明仁已赴美深造。明仁不在位期间，由裕仁之弟秩父宫亲王摄政。皇宫前已竖起了绞刑架，显然是为天皇准备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国民情绪调查的结果显示，对大多数国民而言，天皇在他们关心的视线之外，等于不存在。没有迹象表明，一般老百姓会注意他。如果注意到了，也不过是漫不经心的看热闹的心态：皇宫前面有绞架？后来呢？³

尽管警方报告表达了对普遍的“针对军方和官方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失望和反感”的关注，实际上天皇却罕见地不被包括在批评对象之列。一旦提到天皇，甚至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表现克制，敬意就更别提了。⁴对执迷于维持“国体”的天皇制支持者而言，情形因而既充满希望又潜藏着不祥。正好借民众“对军部的憎恶”（警方文件中的另一用语），自然轻易地实施费勒斯及其助手们鼓吹的在天皇与“军国主义者”之间楔入的政策。同时，各阶层民众迅速坠入贪欲、反社会的行动以及宿命论的心理状态表明，日本人的效忠之心，实际上真的可能是“时过境迁”。就连最老实的无家可归者，也挤住进了神社寺庙，据说就在神殿上晾晒尿布。⁵尽管他们可能没打算否定天皇制，但是多疑之人可能会认定，神圣之所已荡然无存。

美国的一些田野调查分析者，对形势有类似的评价。1945年12月中旬，东京首都圈管辖的情报部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观察家判断，尤其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认为，关于天皇退位对日本人产生的影响，同盟国是担忧过度了。据称，至多可能会发生一些示威游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相比于天皇的命运而言，人们更关注粮食、住房的问题。”12月29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的前两天，同一支情报部队报告说：“有消息来源称，许多人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无论天皇在位与否，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天皇发布元日诏书的4天后，他们评述说，“国民普遍正在接受天皇只是凡人的观念。据收到的报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不再以从前那样强烈的尊敬态度看待天皇。过去3个月来，天皇甚至成了许多笑话中的‘笑料’”。此后不久，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做了一项调查，询问日本人听到日本战败时的感受。比例惊人的普通民众对天皇持旁观态度，只有4%的人选择了

“为天皇担忧，为天皇感到耻辱，为他悲哀”。⁶

有关天皇的笑话和无礼言辞，是表明对天皇的敬畏并非像天皇的支持者或费勒斯和麦克阿瑟所认为的那样的又一小小征兆。将军与天皇的著名合影问世之后，裕仁甚至成了占领期最淫秽的笑话中的笑柄。这个笑话基于天皇不宜被提及的一个双关语：事实是天皇自称的“朕”，与俚语中“鸡巴”（チン）的说法同音。这个粗俗的笑话说，为什么麦克阿瑟将军是日本的肚脐眼呢？因为他就在天皇（チン）上面嘛。⁷

民众层面上的其他事态发展，也表明天皇大约并非不可替代。例如2月份，SCAP的地方情报员报告说，下关地区流行一种谣言，大意是天皇的祖先来自印度，因而他“不是日本人”。据说岛根县的寺庙里有记录可以证明。“真相揭露”的后果是，“一些下关居民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位日本的总统，而不是有印度祖先的天皇”。⁸

这是有趣还是令人不安，得看是站在何种立场而言。这一时期还有一件更加广为人知的真实事件：十几个自称是皇位的正当继承人和天照大神真正子孙或化身的人出现。关注这一系列天皇或女神的冒充者，成了那个穷乏年代使人们轻松的消遣之一，而竟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自称天皇或女神的人士引人关注：在冈山出现的“酒本天皇”，鹿儿岛的“长浜天皇”，新潟的“佐渡天皇”，高知的“横仓天皇”。爱知县竟出现了两位自称天皇的人，“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

1945年9月，自称是菊花纹章的天皇宝座所有者的最有趣的一位，首次将其主张提交给了总司令部（GHQ），并于翌年1月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此人是来自名古屋的56岁的杂货店老板熊沢宽道。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其主张基于可追溯到十四世纪早期的皇统谱系之争，当时皇统分裂为南朝和北朝。裕仁源于北朝系统，但有重要证据表明，熊沢自称所属的南朝更具合法性，应当继承皇室正统。

很快，熊沢宽道的三位亲属声称熊沢是真正嫡系的事实，为熊沢的挑战加油助力，而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持续关注，似乎也成了裕仁的权威失落的另一表现。熊沢宽道巡回全国，得到了一小撮人的支持并引起相当多的人的好奇。他博得的人气，加上他精神振奋的公开演说表明，至少对于某些日本人而言，占据着第一生命大厦的胜利者，比现在正占据着皇位的天皇更有魅力。这位自称天皇的人说，“我认为裕仁是个战争

罪犯”，很快他又接上一句（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还是真正的信仰）：“麦克阿瑟是神国派来日本的使者。”在这些自封的“天皇”中，熊沢宽道的挑战，向现代天皇制赖以存在的所谓太古以来连绵存续的“万世一系”的神话，投下了深刻的怀疑。⁹

这个万世一系的神话可以追溯到天照大神——天皇许多独有的祭祀仪式都是围绕此进行，却很快受到草根们以另类方式的挑战。神道作为国家宗教的废止指令，为民众宗教的复兴敞开了大门。战前被《治安维持法》以不敬为由压制的一些宗教，重新成为精神皈依的活力中心。创价教育学会重建为创价学会，大本教复兴为爱善苑，天理教以本道之名再兴。被边缘化了的神道系的诸分支团体，也以各种形式开始重新独立活动，其中有从战前的灵友会分裂出来的立正佼成会和长生之家。

尽管这些复兴的宗教许多都充满活力，但是它们却在两种战后新兴宗教面前相形见绌。这两种宗教都由女性创立，她们自称与天照大神有特殊关联，并许诺她们的信众以现世的利益。玺宇教由长冈良子创立，她自称为玺光尊，声称自己是天照大神再生，并预言将发生一系列的天地变异，以纠正世界的混乱。玺光尊引入了传统的“世界新生”的千年王国说，她的信徒中有相扑界的传奇人物前横纲双葉山和围棋大师吴清源。1947年，长冈的新宗教引发了新闻界的瞩目。当时警方以违法私藏粮食为由，搜查玺宇的设施，有不少警察被双葉山撂翻在地。

另一种新宗教，是天照皇大神宫教。战争结束之前三天，由山口县的一位农妇北村小夜创立。1944年北村声称有神灵附体，使她能够直接收到天照大神的神谕。北村通过吟唱说教，推行一种忘我状态的“无我之舞”。她严厉批判包括天皇在内的一切权威者，数年之内就吸引了30万以上的信徒。¹⁰

按照日本的说法，战后宗教的繁盛期，最终被称为“神最繁忙拥挤的时期”。天皇的支持者们继续坚持天皇是国民信仰不可动摇的中心，但无数的人却在别处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回到人间

为天皇穿上新衣并将他转换成和平与民主之象征的运动，在几个方面同时展开。为避免天皇在日益逼近的东京审判秀中受起诉，他们进行

了莫大的努力。尽管天皇正式被免于战争罪责的起诉直到 1946 年才真正实现，但是在此之前，天皇已经脱去了他大元帅的军服换上西装，开始了一系列最终几乎遍及全国的巡幸。有关天皇退位的提议，其中有些就来自宫中，很快被压制下去了。宪法对天皇的地位做了大幅修订，剥夺了他的公职权力。在一份顺应时务的宣言中，天皇对自身神格的否定，成功满足了外国批判者的预期。¹¹

这一系列行动中的最后一项，是以元旦全国报纸登载《新日本建设に关スル诏书》（《关于新日本建设之诏书》）的形式完成的。这是自 8 月 15 日以来，天皇首次正式向臣民讲话，但其强大的冲击力则是发生在海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间宣言”，发表之后立即受到英美的热烈欢迎。天皇的“神格的否定”，被看作是他对构成战前天皇崇拜与极端民族主义核心的神的神统的虚妄性的真诚否定。¹²

发表宣言的主意，并非如预想是出自天皇的贴身顾问或 SCAP 高官之手，而是源自一位移居国外的英国唯美主义者和一位美国中层军官。另外，作为传统的日文文本，宣言也缺乏西方人所期待的那种全面的“神格的否定”的内容。运用深奥难解的谜一般的语言，裕仁天皇巧妙地仅从天国下降了一半。主要是由于天皇亲自干预起草宣言，宣言为天皇制攫取了主动权，将其与“民主”等同起来，这种“民主”既不是植根于胜利者的改革政策，也不是源自于民众的积极能动，而是溯源到了裕仁的祖父明治初期的《五条御誓文》。元旦宣言精彩地预示了，天皇 309 的新装将会是如何五彩杂糅。他将会被如何看待，那就全凭观赏者的眼光了。

对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而言，“天皇崇拜”的观念是亵渎神明的。将天皇说成是“天子”，通常在英语中的说法即“神之子”，大有将天皇与耶稣等同的嫌疑。美国人对此深表关注。早在 1944 年，著作繁多的传教士威利斯·拉莫特（Willis Lamott）在其畅销书《日本的罪与罚》（*Nippon: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Japan*）中，就探讨过天皇需要“否定其神格”。美国作战新闻处的分析家们，也在战争结束之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施民意调查的专家们同样得出结论，必须废除“天皇崇拜”。1945 年 11 月，一位有传教士背景的会说日语的年轻军官奥蒂斯·卡里（Otis Cary），趁天皇之弟高松宫访问之际，

大胆向其提出个人建议，天皇应公开否定自己是神。12月中旬，另一位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年轻专家，在国务院以此为题做成备忘录。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这位后来的著名的日本研究者与驻日大使，向最高司令官建议说，“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天皇自愿以言行向其臣民证明，他是与其他日本人或者外国人无异的普通人，他自己并不相信皇族神的起源或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不可思议的优越性，而且除了政府的政策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的‘圣旨’”。¹³

此外，宗教和国家、神权和世俗的权威关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最高司令部禁止将神道作为国教普及的禁令，明确指的是“将神道教义和信仰歪曲为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蒙蔽日本国民并将其诱向侵略战争的意图”。这种有害的思想包括“由于家世、血统或特殊的起源”，因而认定天皇比其他国家的首脑优越，日本国民比外国国民优秀的信仰。¹⁴虽然神道禁令打击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天皇崇拜思想，但它并未引发批评，事实是，平民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当然宫内更关注其暗示的含意。12月22日，天皇与少数身边人士听取了一位日本学者的
310 阐释，被告知，像禁令那样企图用现世的语言来谈论神鬼之事，就如同想“用剪刀剪断烟雾”一样白费力气。从而他说服天皇相信，发布声明平息天皇的神格问题，有助于消除外来的干扰。¹⁵

有一小队人马已经为这样一份声明工作了数周之久，这一计划源于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的特别咨询委员陆军中校哈罗德·亨德森（Harold Henderson）与英国的雷金纳德·H. 布莱斯（Reginald H. Blyth）博士的一次偶然交谈。这两位都是日本问题专家，对日本的文学和文化都有着学术关注。亨德森生于1889年，1930年代曾旅居日本，学习日本语言和艺术。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日语，出版过一本颇受瞩目的介绍俳句的书《竹帚》（*The Bamboo Broom*）。战争期间，他为美国政府管理日语教学项目，并参与制作新几内亚与菲律宾战线敦促日本士兵投降的宣传传单。

布莱斯比亨德森小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莱斯因反战而拒服兵役，度过了两年铁窗生涯。他第一次卷入与日本有关的事务是在1926年。当时，他在朝鲜汉城的日本殖民大学京城帝国大学任教。布莱斯日语流利，与英国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位日本妇女，出版了独创性的

比较文学研究《英语文学中的禅与东洋古典》(*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战争期间布莱斯滞留在日本。在其1941年的著作中，曾评价亨德森的俳句选是“一本小小的杰作”。这两位显然有许多共通之处。10月，布莱斯前往CI&E谋求翻译职位。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了更为合适的机会：在负责皇族和贵族教育的东京名校——学习院得到了教职，并担当日本宫廷与GHQ之间的联络人。¹⁶

日本政府官员相当倚重与GHQ人员的非正式接触，以此探知占领军的政策风向。无论皇室还是其他省厅机构，尽皆如此。由于占领军当局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事务，涉及民主化推进的思想观念问题，成了宫中情报收集和游说活动的主要对象。有时，通过奢侈的游兴节目和高价的礼物达成意见交换与获得美方的支持活动之间，很难划清界限。通常这种互动都是光明正大的，然而，对于日本宫廷来说，没人能比得上布莱斯的才干。¹⁷

布莱斯的活动是每周访问CI&E一两次，总是乘坐政府的公车前往。亨德森是布莱斯定期的联络者之一。11月下旬，亨德森显然是在无意之中开启了那次决定历史命运的谈话。当时就1930年代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的支柱的1890年《教育敕语》，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亨德森评论说，在和平与民主能够生长之前，必须清除日本的国家优越和天皇神圣的错误观念。他沉思着说道，或许，这可以通过新的天皇敕语来实现。

第二周布莱斯再次拜访CI&E时，出人意料地告知，他已经将建议传达给了宫中的联络人，并得到回话说天皇非常愿意遵从。但日方希望在宣言的确切内容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当时CI&E局长肯·戴克(Ken R. Dyke)准将不在，因而在布莱斯的坚持下，亨德森同意亲自起草一份宣言的样本。于是午休时间，在第一生命旅馆自己的房间里，亨德森躺在床上手拿拍纸簿和铅笔，想象自己是否定自身神格的日本天皇写下了宣言。无人见证这创造性的场面，但是这种美国人奇妙的冒昧放肆和漫不经心，听上去却很真实。

亨德森和布莱斯都将这份匆忙草就的“午休文本”，完全看作是非正式的意见。然而，让亨德森震惊的是，一两天后布莱斯带回了一个“可笑”的要求和一枚“重磅炸弹”。首先，应宫内大臣的要求，亨德森

和布莱斯烧掉了亨德森的草案。然后布莱斯自己提供了一份草案，要点基本都是依照亨德森的草稿，并要求亨德森提交给他的上司。亨德森将它拿给了戴克准将，戴克又立即呈交给麦克阿瑟。两位将军都对宫内官员考虑发表这样的声明，表示既惊且喜。而布莱斯火速回转，将他们的欢迎态度回馈给他的宫中联络人。实际上，亨德森和布莱斯都成了天皇的枪手，但此后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震惊。¹⁸

布莱斯的草案被他学习院的同事们译成了平易的口语体日文，而这成了日本方面秘密商讨天皇“人间宣言”的基础。直到年终，整个内阁被召集评议诏书草案，从学习院院长到天皇本人，共有十余人参与其事。由于害怕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抗议，他们警觉地保守机密。有一次，其情景比烧掉亨德森的备忘录还要滑稽。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在男厕所里秘密收到仅供内阁成员参阅的未完成的宣言稿。看来没有人
312 对在这样的场所交换有关天皇神格的物件是否合适提出过质疑。¹⁹

元旦颁布的天皇诏书，显然就是布莱斯草案的日文译本。它保留了亨德森和布莱斯提议的精髓，但却以更加含蓄、庄严的形式巧妙地展示出来。当把最终声明与以布莱斯草稿为基础的最初文本加以比较时，其微妙之处就显而易见了。布莱斯的文本以“有新的理想的新世界，以人性高于国民性为伟大目标”的希望开头。在第二段，它以一段几乎是逐字照搬亨德森草稿的文字对天皇的神格进行否定，声明“我们国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不是基于神话和传说，不是基于日本人继承了神的血统、比其他民族优越、注定要统治他们的错误观念。而是凭借千百年来由献身与爱铸造的信赖和忠诚”。

在第三段，布莱斯的草案强调对家族、国家的忠诚，“在所有宗教的、政治的信条中，一直是日本国民最显著的特征”。然后继续阐释，“正如我们对国家的忠诚要高于对家族的忠诚一样，让我们对人性的忠诚超越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第四段是直面今日之苦难，并寄希望于日本重建为自由国家，将“为人类的幸福与繁荣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总之，布莱斯的文本明确宣布，“陛下完全否认对他自身人格的任何神格化或神话化”。²⁰

两位外国人起草的文本受到宫中肯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肯定天皇与其臣民之间存在“千百年来献身与爱”，简直就与1930年代广为

流传的天皇神话无甚差异。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普通日本人对天皇还几乎毫无意识，而皇室则对普通百姓不是漠不关心就是瞧不起。布莱斯赞扬忠诚是日本人至高、永恒的美德，简直就是对历史的误解，尽管显而易见，他之所以选择强调忠诚，不过是号召超越纯粹的民族主义、“忠诚于人性”的手段。

当时天皇的正式地位仍然悬而未决，宫中不可能期待 SCAP 的友善意愿有更加明确的表示了。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对布莱斯的草案做出实质性的修改。最终版本保留了布莱斯对家国的传统忠诚以及谈到有必要扩展这种精神为“人类之爱”的说法。这样，保留了英文版的基本观点，但又有微妙的保留：不再将对国家的忠诚的地位，明确置于对人类的义务之下。³¹³

另外，修改草案还增加了对近来的“危险思想”、现在更发展为触目惊心的“思想混乱”的警告。天皇强烈批评了这一点。“拖延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我国民有流于焦躁或沉沦失意之倾向。诡激之风渐长，道义之念颇衰。为思想混乱之兆，甚堪忧之。”布莱斯的草稿中并无此言，但这却是天皇的支持者们心头所想。

最富戏剧性的改动，是元日诏书的开头。它全文引用了1868年明治天皇统治之始发布的《五条御誓文》。明治天皇之孙裕仁现在宣布，这将成为舍弃“旧有之陋习”、创造致力于追求和平与丰富文化的新日本之基础。（诏书中没有提到民主。）对许多保守派而言，这才是元日诏书的精髓所在。《五条御誓文》将会成为基准和护身符，它是历史的和心理的支柱，他们可以通过它宣告“新日本”坚实地植根于过去之中。²¹

将诏书的重心从“否定神格”转换为强调明治时代的御誓文，是天皇个人的授意。²²通过这简单的改订，他达成了许多目的。他模糊了明治国家独裁的、神权政治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为新生的战后体制增添了日本固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古老色彩；他无视（除了模糊提到“旧有的陋习”之外）植根于其祖父时代，并形成他自身统治特征的压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有害的国民教化；他公然与以币原、重光、吉田为代表的“稳健派”和“旧自由主义派”结盟，正如他曾公然与军国主义分子结盟一样。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诏书否定神格的公开目的。在此过程中，天皇使自己成为了《五条御誓文》的拥护者，而在其统治的前³¹⁴

20年间，他绝少提及、也从未将其提升到国体的基准的高度。

在天皇此后的宣言中，肯定《五条御誓文》的理想成了“首要目的”，而神格问题成了“次要目的”。他的强调不仅被麦克阿瑟所支持，还得到了加强。据裕仁说，他只不过是打算以提到御誓文为开场白，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此都很熟悉。然而当麦克阿瑟看到这一草案时，裕仁被告知将军（御誓文发布时麦克阿瑟14岁）不仅赞赏明治天皇“达成之伟业”，还敦促全文引用《五条御誓文》。²³

剪不断，理还乱

现在御誓文成了诏书的开头，“人间宣言”被湮没在文本之中。在天皇的亲自参与下，文本被重新改写为文言，删除了布莱斯草案的早期白话译本中明确提到的“神化”天皇与明确否定天皇和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最初草案为“神之子孙”，暂定案中为“神之末”）的信仰的部分。在最终宣言中，先前的关键段落被删减了四分之三，正式的英文版本如下：

朕与国民同在。朕永远乐于分享国民之喜与悲。朕与国民间的纽带始终由相互的信赖和爱而形成。它们并非基于单纯的传说和神话，也并非基于天皇是神、日本国民比其他种族优越并注定统治世界的错误观念。

天皇极力淡化“否定神格”的重要性，因为他说这实质上是安抚西方人的必要的语义游戏。1945年末，他曾在问题浮现的时候，争辩说他从不是西方观念中全知全能的“神”，也不是日本人通常对“神”的暧昧观念所理解的“神的存在”。当然他此前也从未反对被当作神来看待。例如，裁缝们从不敢碰触他威严的身躯，未戴上手套的医生或其他人也是如此，除了他的妻子。他与通常的人类接触几乎完全隔绝。事实上，天皇日常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昭示了他的超凡之处。

天皇现在选择与阁僚们以最拐弯抹角的方式讨论这件事，就是其典型做法。他借听来的逸闻趣事，尤其是十七世纪初期后水尾天皇的事例做参照。这是个简单的、近乎过分简单化的故事，天皇是从担任他的神

道教义顾问的学者那里听来的。后水尾患了水痘，但作为在位的“现御神”，不允许有人对他实行艾灸（一种用燃烧物体的尖端烙灼皮肤的流行疗法）。于是他只得退位。（皇家典籍中许多类似的逸闻之一，是说有位天皇退位是为了纵情吃他喜爱的荞麦面条，而不必总吃专供君王食用的“神圣”的白米饭。）裕仁显然向币原首相和文部大臣前田多门都复述过后水尾的故事，以证明自己对亨德森和布莱斯提案的支持是正当的。裕仁天皇认为，是应当平息这些荒唐事的时候了。²⁴

所有这一切的含意，当然要比水痘和面条复杂深远得多。然而事实上，问题又并非如此神秘难解。天皇乐于否认他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神”，甚至也不是日本人更加暧昧地理解的神，但他不愿意否认他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正如八世纪的古代神话历史所叙述、明治天皇的宪法所宣言、他作为神道的最高神官执行的全套仪式所象征以及二十世纪天皇制倡导者令人作呕地所重申的那样。²⁵

在“人间宣言”不得不提交新闻界的前两天，事情发展到了顶点。除了建议全文引用《五条御誓文》之外，麦克阿瑟还对呈交给他的英文版草案做了一处明确的改动。针对文本中“日本人是神的子孙的错误观念”，最高司令官说，不应当是指“日本人”，而是“天皇”。现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天皇周边的人士不得不考虑，应当如何措辞以表达此意。事实证明，还需要更多的“障眼法”式的修正。

在这点上，布莱斯草案的修正版，宁可保留了直截了当否定天皇和日本人是“神的子孙”（神之子孙、神之末）的说法。然而，天皇的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认为这难以容忍。12月29日，他劝说天皇，即便否定日本国民是神之子孙或许还可接受，但是说天皇源自神的血统是“错误的观念”则完全不能容忍。为能自圆其说，他提议采用深奥难解的表达方式，否定天皇是“现人神”或“现御神”。天皇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一改动。

初期草案中“神的子孙”的字句现在被删除了。最终版本只是否定了日本人比其他民族“优越”和天皇是“现御神”或“现人神”。“现御神”并非全然是个意味不明的字眼，但也不是个日常用词。它自然比正式的英文译本中“deity”（神，神性）这样平实的字眼深奥得多。战时的军国主义者用这个古色古香的复合语（“现御神”这三个字，字面

意义就是“看得见的尊贵的神”，日语发音很特殊）来神化天皇，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难以认识这个词，或者了然其含意。

比如，据木下道雄日记载：外务大臣吉田不知“现御神”的意思，被木下愤然斥为愚者。侍从次长还困惑地发现，12月30日当诏书的准最终版本被提交内阁之际，“现御神”的汉字旁边被标注了读音，以助阁僚们理解其意。简而言之，日文版中的“神格的否定”，要比正式的英文版或是早期版本中模糊得多。无论当日或以后，天皇从未明确地否定他所谓神的血统。他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的整个世界都是建立在这个神话理论的谱系之上。²⁶

天皇没有广播元日诏书。诏书发表在报纸上，并附有币原首相的谨识。纵然受过教育的人可以理解诏书的内容，诏书的最终文本还是典型地经过了古典学者的修改润饰，以天皇诏敕专用的艰深文言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首相的注解则是口语体，依照惯例，将会被当作对天皇诏书的官方解读。这也是“障眼法”式的修正的又一例证，因为首相特意强调了明治时代日本的民主存在。他总结说，“谨奉圣谕，建设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新日本，以慰圣怀”，其重点不过是老调重弹：迄今为止，国民未能顺应天皇的期盼。首相竟然对天皇的否定神格只字未提。²⁷

美国人对元日诏书的反应相当积极。《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说，裕仁天皇以此宣言“使自己成为了日本历史上伟大的改革者”（而且在此过程中，对“混乱的宗教”神道教给予了致命的打击）。麦克阿瑟将军也同样不吝赞美。他昭告天下，天皇以其宣言“担负起了指导日本国民民主化的责任。他将会牢固遵从自由主义的路线”。突然之间，最高司令官把裕仁看作了民主化的领袖，并暗示“未来”他将继续如此。²⁸

私下里，一些曾经真诚相信战时说教的忠诚臣民，震惊于天皇披上的新衣装，感到被出卖了。然而，却没有发生一起诏书的起草者们所恐惧的右翼暴力行为。文部大臣前田吃惊地发现，自己只听到一位来访的长者向他诉苦。²⁹看来绝大多数人都能从容应对“人间宣言”，并未加以重大关注。现在媒体可以用从不被允许的方式自由评论天皇的人格了，而通过这种渠道，裕仁的确以更加亲密、更加“人性”的方式贴近大众了。

许多读者可能会在天皇的《新年和歌》中，发现比元日诏书更为重要的讯息。为迎接每年的新年到来，皇家依惯例将举办命题和歌咏习会，皇室与庶民皆可参加，由宫中召集专家评审。新年之初，评价最高的作品将会与天皇以及显贵们的和歌一同发表。这确实是业余歌人的最高荣誉。体味苦涩战败的那年10月，发布的翌年的歌题为“松上雪”，一个关于忍耐之美的经典意象。天皇自己的和歌，于1月22日在全国发布，全诗如下：

英挺的松树
承受着积雪重压
然而其颜色
却并不会被改变
人民就像它一样³⁰

这是反抗意愿的绝妙表现，读到它的人很少会忽略其中的含意。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天皇的“颜色”并未“改变”。他的臣民们的颜色也不会改变。³¹

注释：

- 1 这首童谣唱道：“第一座桥塌了/第二座桥塌了/皇居下面的二重桥塌了/最后皇居也烧了”；鹤见俊辅、中川六平编《天皇百话》（东京：ちくま文库，1989），上卷，p. 571。其他冒犯天皇的例证，参见同书上卷，pp. 566 - 579；亦可参照 John W. Dower, “Sensational Rumors, Seditious Graffiti, and the Nightmares of the Thought Police”, 收入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p. 101 - 154。
- 2 栗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二卷 败战直後の政治と社会》（东京：大月书店，1980），pp. 87, 246, 336 - 337；亦参见 pp. 40, 194。
- 3 《资料·日本现代史》第2卷，p. 248；栗屋宪太郎、川岛高峰，《玉音放送は敌の谋略だ》，《THIS IS 读卖》月刊，1994年11月号，pp. 64 - 65。有关绞架的谣言，参见1980年10月栗屋宪太郎与渡边清的谈话，《资料·日本现代史》第2卷插页。反皇室思想的其他案例，散见于警方的报告中，参见栗屋编《资料·日本现代史》第2卷，pp. 198, 205, 218, 229, 246 - 248, 251 - 252，同书第3卷，p. 169。政府对此情形十分警戒，特地增员4000人守卫皇居；《朝日新闻》1945年10月27日。
- 4 栗屋编《资料·日本现代史》，第2卷，pp. 38, 197；第3卷，pp. 89 - 94。

- 5 Masanori Nakamura (中村政则), *The Japanese Monarchy: Ambassador Joseph Grew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1931-1991*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2), p. 176.
- 6 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 SCAP, *Occupational Trends: Japan and Korea*, January 9, 1946 (pp. 4-5); January 23, 1946 (p. 18); January 30, 1946 (p. 18). 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Japanese Morale* (Washington, D. C.: July 1947), p. 149; 栗屋《资料·日本现代史》, 第2卷, pp. 121-135。
- 7 袖井林二郎、福岛铸郎编《マッカサー——记录·战后日本の原点》(东京: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82), p. 158; 鹰桥信夫《昭和世相流行语辞典》(东京: 旺文社, 1986), p. 89; Akira Iwasaki, "The Occupied Screen", *Japan Quarterly* 25.3 (July-September 1978): 320。即便是在战争年代, 也有军人对天皇言辞不敬。例如, 武藏丸战舰上的老水兵, 公开抱怨天皇视察军舰时只赏赐给每个士兵少许米酒“太小气”; 参见前引之栗屋与渡边的谈话, 《资料·日本现代史》第2卷。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 称裕仁为“小天皇”的都大有人在, 这是个亲切的称谓, 但却显然不敬。
- 8 Civil Intelligence Section, SCAP, *Occupational Trends: Japan and Korea*, February 27, 1946 (p. 15).
- 9 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 讲谈社, 1989), 第7卷, p. 200; 此文献下引为 SNZ。“熊沢天皇”的故事, 刊登于1946年1月18日的美军报纸 *Stars and Stripes* 以及1月21日的 *Life* 杂志, pp. 32-33。熊沢自称是南朝后龟山天皇的第十八代子孙。1951年1月, 熊沢曾经试图与裕仁天皇打官司, 但是他的诉讼请求遭到驳回, 理由是天皇不能成为诉讼的对象。南朝与北朝的皇统合法性之争, 曾经在1911年成为争论的议题。解决方式是政府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 看似承认南朝皇统的主张, 但却维持裕仁祖父明治天皇所在的北朝皇统的合法性。
- 10 SNZ 7: 190-191.
- 11 1946年4月3日, 远东委员会免除对裕仁天皇的战争犯罪起诉; 6月18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开做出同样的裁决。同年6月12日, 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正式撤销有关“裕仁处理”方针的议程。
- 12 此诏书的官方英译本, 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8: 134-135。
- 13 William P. Woodard,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1945-1952, and Japanese Religions* (Leiden: E. J. Brill, 1972), p. 251; 这份包含文献附录的颇有价值的资料, 出自负责占领军宗教事务的前 SCAP 官员之手。Otis Cary, *War-Wasted Asia: Letters, 1945-1946*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75; 随后再版为 *From a Ruined Empire: Letters—Japan, China, Korea, 1945-1946*, pp. 272-288); 12月18日 Reischauer 的备忘录, 参见 Nakamura 前引书, pp. 109-110。战时美国人对天皇以及日本人心理状态的一般性分析, 参见 Willard Price, *Japan and the Son of Heaven*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5); Alexander H. Leighton, *Hum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Dutton, 1949); Alexander Leighton 与 Morris Opler, "Psychiatry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6 (1946): 20-34, 收入 Robert Hunt 编, *Personalities and Culture: Reading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Garden City, N. 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67), pp. 251-260;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The Relation of Anthropology to Modern Life* (New York: McGraw-Hill, 1949); 《天皇百话》上卷摘录五百旗头真所言, pp. 581-603。

- 14 关于废除神道教为国教, 参见 Wilhelmus H. M. Creemers, *Shrine Shinto After World War II* (Leiden: E. J. Brill, 1968)。12月15日的神道禁令, 收录于 Creemers 前引书, pp. 219-222。亦可参见 Helen Hardacre, *Shintō and the State, 1868-198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67-170。
- 15 Hardacre 前引书, p. 137; 木下道雄《侧近日志》(东京: 文艺春秋, 1990), pp. 83-84。
- 16 关于 Henderson 与 Blyth, 参见高桥紘所写木下道雄《侧近日志》编后记, pp. 333-341。
- 17 Blyth 的角色, 在木下的日记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宫内与美方的某些“联络”, 是由过去曾深深卷入军国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活动的人担任的, 现在这些人物又竭诚向 GHQ 高官们提供宴饮游乐、女人和日本的刀剑、和服、珍珠以及照相机等礼物。其中的两位后台老板, 在木下的日记中, 自称是所谓“美国清教徒俱乐部”(American Puritan Club)的成员, 与 CI&E 上层有着切实紧密的联系; 参见木下《侧近日志》, pp. 91-97, 352-355, 以及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终战史》(东京: 岩波新书, 1992), pp. 65-72。
- 18 见 Creemers 前引书, pp. 121-132, 尤可参照 pp. 223-225 (“Henderson 的草稿”); Woodard 前引书, pp. 250-268, 315-321 (这份资料依据的是“Henderson 的草稿”及访谈)。
- 19 尽管日方的文献, 无论是原初的记录还是事后的追记, 都乐于对草案的起草过程进行描述, 但是这些历史叙述之间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有些追忆, 是故意混淆视听), 已经不可能复原当初的历史情形。除上文引述的文献之外, 还可参照松尾尊允《象征天皇制の成立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 《思想》1990年4月号, pp. 11-18; 高桥紘、铃木邦彦, 《天皇家の密使たち・占领と皇室》(东京: 文春文库, 1981), pp. 81-84; 1962年的文章, 收入《天皇百话》下卷, pp. 199-210; 前田多门1962年的回忆, 收入同书下卷, pp. 211-226, 亦参见文艺春秋社编, 《〈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东京: 文艺春秋, 1988), 第2卷, pp. 18-25; 木下《侧近日志》, pp. 88-96。
- 20 Blyth 草案的英文版, 收入松尾尊允前引文, pp. 13-14, 内有少许语法错误, 应当不是正式版本。
- 21 《五条御誓文》全文如下: “一、广兴会议, 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 盛展经纶。三、官武一体, 以至庶民, 各遂其志, 勿使人心倦怠。四、破除旧有之陋习, 一本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 大振皇国之基业。”至此, 强调《五条御誓文》的重要性被完全确立起来。1945年8月29日, 在广受瞩目的记者招待会上, 新任首相东久迩宫曾吟诵五条御誓文作为结语; 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收入日高六郎《战后日本思想大系》(东京: 筑摩书房, 1968), pp. 53-58。

- 22 《天皇百话》下卷, pp. 208, 218-220; 木下《侧近日志》, p. 89。
- 23 1977年8月23日会见记者时裕仁的回忆, 收入高桥纮《陛下、お尋ね申し上げます——记者会见全记录と人间天皇の轨迹》(东京: 文春文库, 1988), pp. 252-254。亦参见高桥纮所写木下道雄《侧近日志》编后记, pp. 345-346。
- 24 木下《侧近日志》, p. 84; 参见《天皇百话》下卷前田多门的叙述, p. 218; Woodard 前引书, pp. 253-254, 266。
- 25 参与起草“人间宣言”的日本人都认为, 宣言无损于天皇的地位, 而且他们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 即外国人完全误解了日本人对其君主看法。他们主张, 天皇从未被看作西方意义上的“神”。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但也十分诡诈。从历史上来看, 天皇(以及早期的女天皇)曾经充当过各种变幻的角色: 最早的巫师与农耕仪式的司祭; 八世纪时达到权力巅峰的宗教领袖; 此后的高度文明的权威, 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代, 天皇经常无权、无钱且被挟持。八世纪成书的《古事记》与《日本书记》, 是日本最早的神话纪事, 记录了从天照大神以降的天皇世系, 而皇家典范也巩固了天皇大祭司的地位。登基仪式是为了表明天照大神与后继的统治者之间的神圣关联, 而天皇前往拜谒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或传说中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天照大神的子孙)在奈良的陵寝, 则被看成是向皇家的神圣先祖致敬。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普通的日本人假使真的知道天皇的存在, 其实也漠不关心。除了一小撮知识分子外, 多数精英人士也对此少有关注。

这一切在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统治的漫长时期(1868-1912)内发生了改变, 因为此时天皇制被创造性地“复兴”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机轴”。在明治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伊藤博文直接指导下, 现代天皇制被明确地创造成了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在日本的对应体系; 八世纪的神话历史被复活成了政治信仰; 迄今仍广为流布的民间宗教神道教, 当时成为国教, 约有12万座神庙被置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 可参见英文文献 Emiko Ohnuki-Tierney, “The Emperor of Japan as Deity (Kami)”, *Ethnology* 30.3 (1991): 199-215。)最具重要意义的是, 明治天皇被宣布为活着的神(“现人神”或“现御神”)。对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而言, 他们打造这位新的崇拜对象, 并且仔细体察西方的模式, 显然是要野心勃勃地创造与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全能的上帝”类似的偶像(参照 Ohnuki-Tierney 前引文, p. 204; Woodard 前引书, p. 370)。这些伪宗教性的表述, 皆被写入1890年的明治宪法。此宪法宣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规定的确切含义, 在与宪法同时颁布的权威性的《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中阐释如下:

开天辟地之时, 确立神圣皇位。天皇实乃天神至圣。英明神武超乎全体之臣民。须崇而敬之, 不可亵渎。天皇当尊重律法, 然律法无权约束天皇。非惟不得对圣躬不敬, 指斥言议亦不可犯之。

在裕仁天皇统治期间, 明治宪法中神权统治的独裁理念才得以充分实现。裕仁所受之教育乃信仰国家主权, 而且私下里他赞同将他本人喻为国家的最高“头脑”(这一比喻也用在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中)。从他1926年即位到“二战”结束, 无论其个人想法如何, 昭和天皇确乎顺从地接受了神格化的仪式与说辞。效忠天皇的哲学家们庄重阐明, 与欧洲的君权神授或中国的“天命”不同, 天皇本身就是“神君”, 他的旨意乃“神谕”(参照 Creemers 前引书所引哲学家和辻哲郎的说法, p. 118)。天皇忠诚的臣僚们在人人必读的官方文本, 如1937年文部省

发行的著名的《国体之本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谨慎而明确地解释了天皇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神（上帝），而是具有独特的日本式的含义：

天皇乃以皇祖皇宗之御旨统治我国之现御神。供奉现御神（明神）或现人神，非如所谓绝对的神、全知全能之神之意味，乃昭示天皇为皇祖皇宗之神裔，天皇与皇祖皇宗御一体，永久为臣民·国土生成发展之本源，当示以无限之敬畏（参见 Creemers 前引书，p. 123）。

不同的日本人对此中含义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无人不晓“天子”不仅统治臣民而且超凡入圣。在裕仁替他有精神疾患的父王摄政期间，依据 1925 年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否认天皇是神是大不敬的罪名。天皇虽然对各项事务广泛发表意见，却从没有为那些因此而入狱的人说过只言片语。“二战”期间，日本的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与圣洁会基督徒因为拒绝承认天皇不同于常人而被捕。1942 年的内阁秘密会议上，东条英机首相严肃声明“天皇是神……而我们，无论如何位极人臣，不过是常人而已”。与以往的说辞一脉相承，天皇 8 月 15 日的投降广播（玉音放送），亦被称为终结战争的“圣断”。

带头保卫裕仁天皇与“维持国体”的高官们，大部分都是 Joseph Grew, George Sansom 等英美权贵所欣赏的亲西方的“稳健派”。他们无一例外都将天皇看成神。当重光葵在狱中得知天皇将被免于战犯起诉时，高兴地大叫“日本国民将天皇当作神来崇拜是完全正确的”（《天皇百话》下卷，p. 130）。币原喜重郎首相即便是在起草“人间宣言”之时，还虔诚地提到天皇的“神格”（参见 Woodard 前引书，p. 254；“神格”一词，确曾出现在布莱斯草稿的早期日译本中，尽管这正是天皇陛下所应当否定的）。

26 木下《侧近日志》，pp. 89–91；《天皇百话》下卷，p. 202。

27 松尾尊允前引文，p. 17。

28 1946 年 1 月 2 日《纽约时报》。关于麦克阿瑟，参见 Government Section, 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D. C.; 1948), vol. 2, p. 471; Woodard 前引书，p. 268。麦克阿瑟私下里也喜欢给天皇戴高帽。他曾告诉民政局局长也是他最信赖的助手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准将，“天皇对民主理念的领悟，比任何跟我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要彻底”；参见 Courtney Whitney, *MacArthur —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56), p. 286。幸好麦克阿瑟没跟多少日本人打过交道。

29 《天皇百话》下卷，p. 224。

30 加濑英明《天皇家の戦い》（东京：新潮社，1975），p. 207。

31 1947 年天皇的新年和歌，恰好描绘了重建的意象。全诗如下：“天欲晓/晨曦沐水户/依稀传来捣砧声”。当 1948 年新年来临之际，裕仁天皇重拾战败后他首篇诗作的主题。这一次，天皇陛下发表了两首诗作。一首吟诵海岸边的松树，迎着四季猛烈的海风傲然挺立。另一首描绘孤独的园中四季常青的松树，即便冬日来临也不变色（天皇诗作的英译版，见 1947 年 1 月 24 日、1948 年 1 月 2 日《纽约时报》，收入 Arthur Tiedemann 编，*Modern Japan* 修订版 New York: Anvil/Van Nostrand, 1962, pp. 184–186）。

天皇“人间宣言”的发表，并未立即终止战后教育体制中有关天皇崇拜教育

的某些举措。例如直到1946年4月6日，文部省才颁令声明，无须再向学校中供奉的“御真影”（天皇像）敬礼；7月才正式废除学校中供奉“御真影”的圣所（奉安殿）。到了1946年9月29日，文部省才决定停止在学校典礼上颂读1890年的《教育敕语》。尽管如此，仍然规定学生在课上学习《教育敕语》（以天皇为核心的德育之重要文献），因为它包含“真理之言而并非只是出自天皇之口”。参见美国国务院之秘密报告“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Japan since the Surrender”，December 9, 1946, pp. 27 - 28；此秘密报告之缩微胶卷，见 *O. S. S. /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I — Postwar Japa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reel 3, number 28。